

戴笠的幾個戰場（二）

費雲文

情報戰場遭受挫折

汪精衛自民國廿七年由重慶出走後，於次年到達上海，即與周佛海等在日敵的羽翼之下，進行其組織偽政權的工作。同時，彼等自知冒天下之大不韙，必將成爲「國人皆曰可殺」的目標；所以，特地利用原在國民黨中央黨部擔任處長，因過失被斥責的丁默村，以及原係共產黨徒，被捕潛逃的李士羣爲爪牙，在上海組成特務工作總部；（因爲總部係設在極司非爾路七十六號，所以簡稱七十六號）聯絡日敵的特務、憲兵等機關；以威脅利誘的手段，專門對付地下工作人員，尤其是戴雨農的軍統局人員。由於同爲中國人士，有些人過去比較瞭解熟識；加以奸僞歹徒的百般詭詐，以及日敵的乘機肆虐；因此，自民國廿八年七月以後，軍統局在上海的工作組織，受到很大的壓力，也有相當的挫折；而且牽連影響到南京、青島、北平、天津、安慶等地；成爲戴雨農主持特種情報工作以來，在間諜戰場上，第一次遭受敵人最嚴重的挑戰。

七月十四日，奉戴雨農命令由越南追踪汪精衛到上海，繼續執行誅劬任務的王魯翹，接到軍統局的卸任上海區長王天木的邀約，約他到寓所

密談。王魯翹以爲有緊急公務，欣然赴約，孰料在赴約的中途，忽被日敵憲兵隊便衣五人預伏攔劫，企圖以強行綁架方式，由法租界密解出去。王知情勢嚴重，乃機警應付，儘量避免落入日敵之手。一面以柔道搏擊，與敵憲週旋；一面高呼「綁匪架人」。經十數分鐘糾纏，爲法捕房的華籍警探所發覺，將王魯翹與敵憲便衣五人，帶往法捕房。日敵指證王爲重要的重慶恐怖份子，要求立即引渡；但遭法捕房拒絕。（註）

原來，王天木和辦人事的陳第蓉，還有忠義救國軍的支隊長何天風；已經因爲生活糜爛而被誘失節，供敵僞驅策。憑他們的記憶，提供線索給日敵憲兵與特工，對軍統局在全國各大都市的秘密工作組織，作全盤性的偵搜破捕。

陳第蓉變節後，立即將上海的全部組織名稱與住址、人員名單，提供敵憲兵隊，會同兩租界捕房，搜查軍統局的滬區人員住所及辦公地址達十三處之多。幸而在法捕房任職的劉俊卿，是戴雨農所秘密運用的同志（與滬區書記鄭修元有聯繫，且有結義兄弟之雅），當他知道逮捕的內情以後，立即於事發之先密告鄭防範。鄭當即分頭秘密轉知各有關部門緊急應變，才不致被其一網打盡；而能遷移地址，照常工作。

陳第蓉曾經在軍統局的南京區主辦過人事，爲了向敵人獻媚邀功，再將南京一帶的內情向敵人密告。八月十二日，安慶站長蔡慎初被捕，在送經刑訊利誘之下，誓死不屈。曾在監中題有「爲國捐軀老益壯，文山氣節留侯志」，以及「苦心感清操，勵節托幽篁」的詩句以明志。（後來被解送南京，復沿途高唱革命軍歌，觀者動容；船經蕪湖，在軍統局同志的巧妙安排之下，獲救脫險）安慶站的工作，並未因蔡站長被捕而受影響，仍然很有績效的繼續進行。

香港方面，自上年敵軍攻陷武漢與廣州以後，英人以爲我國抗戰已無希望。於是，一面公開宣傳，促我與日敵謀和；一面受日敵的壓力，對軍統局在香港的秘密組織，大肆摧殘。幸賴香港區區長王新衡和書記兼行動組長劉方雄的沉着機警，巧爲應付；雖然電臺兩度遭受破壞，但能保存文件，照常維持工作。其通訊員袁良弼由港因公赴上海，也因爲不知王、陳已叛變，而於八月間被誘捕，迭遭敵憲兵非刑拷打。袁已六十以上高齡，也能忠貞不屈，特作血書以明志：「易水空餘恨，成仁待斷頭；丹心爲黨國，碧血濺洪流。任教橫誹謗，精忠不自休；鐵窗羈病體，不作洪承疇。」（後來由戴雨農派人營救出獄，幾成

殘廢。)

南京方面，戴雨農在王、陳等叛變之初，即電知南京區長錢新民，囑其一面加以防範，一面設策誅鋤叛逆。可是，南京區曾於是年六月十日，乘敵偽要員嚴村中將、梁鴻志(偽南京維新政府負責人)、溫宗堯(偽維新政府院長)、高冠吾(偽南京市長)等廿餘人，在日敵南京領事館舉行宴會的機會，派行動人員滲入其廚房，偽充侍役，在食品內下毒；毒死敵華中軍山田司令部高級參謀三浦大佐、敵領館書記船山、宮下吉玉等三人(其餘多人中毒較輕，未致死命)。敵軍憤怒之餘，在南京大肆偵查搜索，務期早日破案。錢區長爲了暫避鋒頭，將區內重要文件及部份人員移往浦鎮附近；而留組長譚文質在京負責，蒐集情報；所以尚無法誅鋤陳逆。而陳逆竟然先發制人，於八月十九日，會同敵駐京憲兵隊搜捕京區組織人員；復脅誘譚文質附逆，於九月十一日將軍統局設於南京城內的秘密電臺破捕。南京區遭此重大打擊，並未畏縮；而由書記兼行動組長尙振聲，化裝出入於挹江、和平諸門，聯絡潛伏在城內的同志，努力恢復組織，推進工作。

由於王天木曾在平津工作多年，平津的軍統局組織人事，他相當瞭解；於是他的舊屬斐吉珊和張奉馨二人前往平津一帶，爲敵憲兵隊作鷹犬，專門指揮軍統局的工作組織和人員。九月廿七日，在天津河北大經路，將抗團團長兼天津區長曾澈當路捕去；「抗團」的工作，並未因曾澈的被捕而銷聲匿跡；反而由天津擴展到北平，成立北平分團(詳情請參閱「戴雨農與抗日殺奸團

」)。廿八日凌晨，再會同英法捕房，在英法租界大舉搜捕軍統局的地下工作人員，捕去天津站長陳賚一、軍事組長鄭恩普等人。陳賚一被捕後，堅貞不屈，曾賄通獄卒密出一函，請人轉致戴雨農云：「津站工作，速請另派人員負責，本人既入敵手，難獲生還，已抱定最大決心，準備犧牲，抗日到底。」(民國廿九年五月十三日，陳就義天津，年四十一。陳，湖南邵陽人，北平中國大學畢業；參加軍統局工作之前，累任第二集團軍處長職)。

青島方面，青島站的行動組長趙剛義，與王天木等有勾結；以赴上海洽領經費的機會，受王等誘惑投敵，於十一月十五日，自上海引領敵憲兵抵達青島，出乎意外的破捕青島站組織，搜去工作人員名冊，脅迫代站長傅勝藍招供所屬各組和電臺的住地，按圖索驥作一網打盡的搜捕。當直屬通訊員王志超被捕的時候，傅勝藍居然在敵軍的脅迫下，勸他降順附逆。王志超凜然正氣，痛斥傅貪生無恥，並且對敵軍說：「我乃黃埔學生，戴雨農的幹部，要殺就殺，決不屈服投降！」慷慨激昂，敵爲敬佩，不敢加害(被判處徒刑十年，於勝利後釋出)。

十一月廿四日，這場災難，終於牽連到北平，北平區和所屬電臺被破獲，副區長周世光、臺長張樹德等多人被逮捕。周等也熬刑不屈(於廿九年九月八日在北平南苑同時就義。周，湖南湘鄉人，曾任第三軍科長及安徽崇實中學校長；張，浙江天臺人，電臺臺長)。

註：王魯翹被捕後，誓死不承認係重慶危險份子；但因為越南河內刺汪的案情，被叛逆告密，而於民國廿八年農曆除夕，被押送到河內歸案。河內法院判王無期徒刑。民國卅四年八月，抗戰勝利；王與先已在河內被捕的余鑑聲、陳邦國、張逢義同時恢復自由，戴雨農曾以專機迎接他們回國。

清除內奸重建組織

本來，軍統局在上海對敵軍和漢奸的破壞誅劊工作，是非常積極的，也使敵偽受到鉅大的創傷，敵軍駐上海的特務組織，早視軍統局的地下活動如芒刺目釘，務必斬盡殺絕而後快意。自汪精衛抵滬，組織偽特務機構，專門對付軍統局地下組織以後；狼狽爲虐，事態嚴重，加以上海部份重要幹部的叛變。戴雨農深深瞭解，軍統局的地下工作，已經由主動攻擊優勢而陷於被攻擊的逆境。如果無法克制反擊，不但敵偽置張，明暗異勢；而且對淪陷區的效順中央的民心，將會發生不良影響。這一情報戰場的勝敗，關係到整個抗戰的前途。因此，戴雨農除了運用軍統局的力量，再接再厲的，愈挫愈奮的，從艱困的工作環境中，誅鋤叛逆，壓制敵偽，爭取勝利外；並且從各方面發動敵後的廣大民衆，共同制裁敵偽。好像奇兵突起樣的，使敵偽防不勝防。同時也用以發舒民氣，振奮人心；而在聲勢上把握優勢。

情報組織方面，除了在各地就已被破壞過的殘餘組織，加強整頓，變更方式，仍留該地繼續工作外；並且積極擴大增建複式佈置。上海爲通

部大邑，更是當時汪精衛與日敵密謀建立偽政權，企圖分化我國的接頭中心；所以是蒐集情報最重要的地區。雖然，上海區的情報組織，在王、陳等叛變後，仍能立足，繼續維持工作；但所有工作人員與工作方法，向爲王、陳等所熟悉，活動起來，難免多有顧慮，同時也隨時有再被破壞的可能。因此，戴雨農特地遴選一位與軍、警兩界以及上海社會素無瓜葛的書生型人物，到上海去另行建立新的情報組織上海第二區。

這一位從來沒有擔任過地下秘密組織工作的人物，就是戴雨農在江山文溪小學的同學姜紹謨。姜紹謨，北京大學畢業，少年得志，北伐以後，就曾經出任過浙江省黨委、校長，以及教育部司長等職。抗戰開始後，才參加戴的軍統局，在重慶局本部工作。當戴與他談起上海工作遭到挫折，希望他能夠去另建新的組織之時；他毫不考慮的，一口承諾。

雖然他沒有從事地下活動的經驗，但他很明瞭當時的處境，很注意把握原則。他到上海以後，除了書記陳祖康以及與戴雨農通訊的無線電台是軍統局配屬的以外；其他工作，完全不憑藉軍統局的淵源，他不與軍統局的有關人員來往，而以他個人過去北大同學和黨政工作的關係，逐步的發展工作。知道他的人，總以爲他是爲了響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而來上海的。他以此爲烟幕，利用偽錢幣司長梅哲之和偽文官長徐又霖，從偽府要員陳公博處蒐集外交政經情報。並且利用偽海軍部長兼第二方面軍總司令任援道的弟弟任西平的關係，秘密策動任援道，任因而親筆上

書 蔣委員長，表示「身在曹營心在漢」決心擁護中央，並且表示等候國軍反攻，他一定捉汪自效，率僞軍反正。對於日敵軍部方面，他也找到一位正在敵軍特務機關走紅的旅日華僑，蒐集軍事情報。這位日本通王同志很有辦法，居然能替姜弄到一張上海日軍特務機關的汽車牌號，使他能「禁區」暢行無阻，而不被懷疑檢查；對他的密勿工作，也有很大的幫助。

由於王同志的關係，敵軍特務機關的某一譯電員，也被姜吸收爲情報員。於是，很多重要的敵軍軍事情報，都落到姜的手中。比如有一次敵機決定飛往重慶轟炸設在羅家灣的軍統局，就因爲姜的預先急電通知，而使軍統局得以作有組織的徹底疏散。結果，敵機祇炸壞幾處空屋，徒勞無功。

姜紹謨在上海的情報活動，非常成功；這說明了戴雨農應變的方法，知人的識見，以及用人的時機，的確高人一等，而有獨到之處。

加強情報的組織和蒐集以外，最重要的，莫過於對叛逆的誅鋤，戴雨農當然有所成算。他以爲部份幹部所以背叛，七十六號所以囂張，是因爲有個賣國求榮的汪精衛；他們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與日敵勾結越來越積極的汪精衛身上。因此，如何設法誘導王、陳等將計就計，誅鋤汪精衛，以自贖自效，爲國家除去無窮後患，才是上策。必不得已，再行誅鋤背叛之事。

當時，有一位曾任上海行動組組長的劉戈青，暫在香港避鋒頭。原來，劉戈青於淞滬淪陷後的兩個月之內，曾經率領他的行動組，在徐家滙

火燒日本東亞同文書院，並且一連執行十一次行動案件，誅鋤僞上海市民協會常委會主席顧馨一等重要漢奸十餘人；民國廿七年大除夕，再突入以梁鴻志爲首的偽維新政府的外交部長陳錄私宅，鋤奸成功。一時，上海敵僞，相顧失色；日敵特務機關特別以四萬元的巨款爲懸賞，企圖緝捕劉而甘心，所以劉才奉命離滬暫留香港。

劉戈青正計劃如何回到上海，接近王、陳而手刃之。忽然接到王天木自上海寄去的函件，慫恿他去上海投汪，「共襄大事」。究竟王的真意如何？誘捕？招兵買馬？難以揣度；當即轉呈戴雨農請示。戴復電叫他赴渝面商。

劉於民國廿八年八月十日赴渝，戴判斷王的真意，當爲誘捕獻功，貪圖賞金。劉以爲正可以乘機混入敵人陣營，接近王、陳，相機行事；或竟進行反間。當然，以敵軍對劉痛恨的程度而言，這是相當冒險的。可是，劉慷慨豪壯的向戴報告：「爲了維護組織的工作，整飭團體的紀律，任何犧牲，在所不惜；個人生死問題，請先生不必顧慮。」戴見他出於一片至誠，而且也知道他素具機智膽勇；乃同意他的想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經過一番安排，一星期後，戴命令劉經過香港回上海，赴王天木的函約；明白的交付劉兩大任務：(一)策動王天木、陳第蓉，將計就計，擔任反間工作；祇要有利於國家民族，自可將功折罪。(二)與王天木密商，誅鋤汪精衛；如果成功，不但可贖罪，而且可受重賞。並且拿出一封他親筆寫給王天木的書信，命劉到上海後，當面交給王

天木。

是年十月四日，劉戈青到了上海，六日，安然和王見面，將戴雨農的親筆書信交給王。當王看到信上所寫的：

「余遇君素厚，第念數年來患難相從，凡事曲予優容，人或爲之不平，余則未嘗改易顏色，似此無負於汝；而汝何竟至背余事逆耶？汝天理何在？良心何存？」

「汝一人投敵，曷爲一時失足，容有可諒之處；今復函誘戈青附逆，是汝甘心作賊而欲自絕於國人矣。余不欲戈青來滬，惟念汝現居逆方高位（註：汪許以軍政部長職位），有機與汪逆接近，正可乘間爲我而圖之。故特准戈青重履險地，卽爲我達此意與汝也。若果能出此，則不惟往者不咎，且必能以汝之此項功績，而邀逾格之重獎也。戴罪圖功，此其時矣。望毋負余意，餘由戈青代達……」

王不覺緊張汗流，幾乎癱瘓在沙發上；當面應允聽從戴的命令，掩護劉接近汪而下手誅戮，以中國法。當時議定乘雙十國慶汪成立「新政權」後閱兵的機會，由劉化裝王的衛士，混入閱兵場，相機行事。可是，汪成立「新政權」的計劃，未能如期實現，閱兵也被取消了。劉以爲誅汪的行動，最好能在他成立「新政權」之先，才最具意義；何況，他自己是個被懸賞的「通緝犯」，怎能曠日持久？於是一再催促王，迅以具體的事實表現，向戴雨農和全國人民作悔過自新的交代。

戴雨農知道劉戈青和王天木接洽的情形，嘉

許王天木的決心鋤奸贖罪；並且還答應他的請求，送他四萬元法幣，以爲活動工作的費用。可是，王却向劉聲稱誅汪之事，他一人力量有限，最好能再找陳第蓉加入。劉奉令返滬，本有策動陳反正，戴罪圖功的任務；當然欣然同意；於是，在王的安排下，劉和陳見面。

詎料陳第蓉居然開出條件，請戴雨農釋放他在後方被捕的家屬，才肯與劉合作。劉急電戴報告；並且建議迅派專人將陳的胞妹釋送上海，和陳相聚，以安其心。

陳第蓉的胞妹陳第燕，由劉的舊屬朱三元送到上海；當面把她父親的一封信交給他胞兄。陳關切而又緊張的拆開書信，他那位讀書明理，精通法律的父親，却很嚴厲的在書信上訓斥他：

「按古律，叛逆者，罪夷九族，今汝不肖，累及家人；幸蒙優待，未及言誅者，政府之曲容也。如汝尚有天良，當思戴罪圖功，否則，噬臍莫及矣！」

陳第蓉看到他父親的書信，尚在猶豫，他妹妹陳第燕却跪在她哥哥面前，聲淚俱下，要求陳不再做漢奸，否則她寧可跪死，也不起來。陳無奈之下，祇好表示：「爲了不使父母傷心，從此改過，不做漢奸」。陳第燕看到她哥哥應允不再做漢奸了，才起來兄妹相見。劉戈青向陳交代此事以後，問起陳誅汪反正之事；陳約他等待時機，隨時聯繫。

誰知，陳劣性不改，藉口加強彼此聯繫，與劉幾次酬應以後；竟然親自開車，將劉誑到七十六號僑特工總部關了起來。顯而易見的，陳第蓉

不但不知悔改，而且也出賣了劉戈青。

當時，七十六號僑特工總部的嚴刑拷掠，是出了名的「閻王殿」；劉戈青自揣必受摧殘。不想第二天，七十六號的要員李士羣親自和他晤談，把劉從監牢內請了出來，待以賓客之禮。幾次談話，甚至對飲小酌；一方面勸劉參加他的特工總部，許以京滬方面的要職，「共圖大事」；一方面想以輕鬆的友誼氣氛，套問劉此次奉命來滬，究有幾人？以及軍統局在上海的虛實。

劉的意志堅決，而態度嚴正；除了暗示他已準備隨時犧牲，不願與李等「共圖大事」外；還虛虛實實的稱贊軍統局在上海力量強大，甚至祇要他隨便打出去一個電話，就會有同志冒險來看他。

李對劉的話將信將疑，裝出一片愛惜英雄好漢的豪氣，向劉表示：「電話就在旁邊，可以馬上打出去；如果你的同志真的能僅憑你一個電話，就不顧一切後果的跑來看你，我可以讓你們自由交談，絕不派人監視。」

劉立即打電話給朱三元，朱三元本來是劉戈青主持上海行動組時最得力的幹部，接到電話，毫無後顧的應約赴滬；最難得的，還有位不是軍統局同志的商人包天擎，却以友誼的立場，陪同朱三元身入虎穴。

朱、包二人迅速如約而至，頓使李士羣又敬畏又嫉恨，越想儘量利用劉來對付軍統局。另外，既然假裝慷慨的姿態已經擺了出來，祇好「大方」到底。於是當面對劉、朱等恭維他們的肝膽相照，不愧爲真正講義氣的朋友；一面吩咐手下

不准監視他們，儘量給他們方便；一面很客氣的道了「少陪」。

這時，劉縱有千言萬語，也無法向朱等傾訴，除了對包天擎的見義勇爲，特致謝忱外；當即寫了張紙條交給朱三元，叫他帶回去密呈戴雨農；上寫：

「受命來滬，原擬乘機擊逆首懸於闕下，孰料天不假其便，數月來迭遭變故，今更身入樊籠，自問必死。此間處境離萬分惡劣，必要時決心一死，上報知遇之恩；下贖方命之罪，絕不以團體的生命，換取個人的自由。效乘三元兄之便，謹奉寸柬，以明素志；並托帶還賜錶，呈於鈞前……」

除了這封書信，劉又從手腕上拔褪下一隻手錶，請他一併交還戴雨農。

朱三元，看到這封信，再看到手錶，不覺感動流淚。原來，當時一隻名貴的手錶，來之不易；戴雨農爲了激勵工作，常拿來贈送給有功的同志，一則使同志感到光榮和珍貴；同時也可以因爲時間準確，不致誤事。劉的這隻手錶，就是他在上海誅鋤漢奸後，戴贈送給他的。現在退還贈錶，分明是表明必死的心跡，同時也有一種留爲紀念的想法，實在是意義深長。

朱三元安然走出七十六號，回到重慶，報告戴雨農，包天擎却以朋友身分，每隔三兩天，就跑去探望劉戈青，送衣服送飲食，相當殷勤。

自劉戈青被陳第蓉誘捕後，加以青島、北平的組織，仍然因爲王、陳背叛的關係而相繼被破壞；戴雨農覺得，他對同志的失足，已充份給予

改過自新的機會，而且有求必應，真可謂仁至義盡了。既然王、陳等已無悔過反正的可能。於是由他自己策劃誅鋤工作。他很瞭解王天木和他幾個親信人物的關係；所以他找到一位出乎叛逆防範想像以外，而事實上最適當的高級幹部，去秘密進行。這位幹部，就是常在北方活動，而和上海的工作殊少往來的吳安之。

吳安之到了上海，找到王天木的保鏢馬河圖；以同鄉的情誼和國家大義、組織的精神來感動他；並且對他下達戴雨農的命令，讓他做誅鋤叛逆的執法者。馬河圖雖然受王天木的恩養，但他也素來敬重吳安之的爲人正直誠篤，更佩服戴雨農的威嚴氣魄。在吳對他開導：

「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留芳遺臭，在你一念之間；將功折罪，鋤奸自効，才有光明前途」，以及戴的嚴令之下；他幡然醒悟，慷慨接受命令，吳安之還叫他與戴雨農已經安排好的內線行動人員丁寶林和許清江，聯絡合作，相機行事。

民國廿八年的聖誕夜，正當王天木、陳第蓉、何天風等與幾個日敵漢奸輩在舞場行樂之際，馬等動手鋤奸，當場殺死陳、何工人；王天木剛巧離座上廁所，倖免脫去。但事後，因爲馬河圖是王的親信保鏢，而事發之時，王又離去；敵僞懷疑是受王的主使，而將王逮捕審訊。

馬河圖一擊成功，吳安之立即偕馬離滬，同赴河南，許、丁也離開上海，回到後方。不久，奉到戴雨農的命令，派馬河圖爲新鄉行動隊長長。馬感奮之餘，非常盡力；曾經滲入敵軍新開關

的飛機場，炸毀九架敵機，炸彈四千餘箱。燒掉汽油倉庫兩座，汽油七千餘桶。

李士羣既無法使劉戈青變節，收爲己用；也未能從劉的口套取任何秘密；於是改變態度，對劉嚴刑虐待。一直拖到民國廿九年五月，劉才找到機會，設計脫逃魔掌，回到重慶。

太行山區敵後作戰

民國廿九年，國軍爲了控制黃河北岸的廣大地區，在第一戰區的統轄之下，已設有三個主要軍區；西邊是中條山軍區，中間是太岳山軍區，東邊是太行山軍區。中條、太岳接連在一起，南臨黃河，渡口控制在我駐軍手中，與後方交通非常便利。祇有太行山區，才是惟一孤懸在敵後的抗戰根據地。太行山軍區，東西三百多里，南北兩百多里。北面是共軍佔領的區域，表面上是一條戰線，實際上隨時找機會襲擊友軍，作兼併坐大的打算。東邊是平漢鐵路、南邊是道清鐵路、西邊是白晉鐵路、潞澤公路、晉博公路；這三方面交通線上的重要據點，都駐有敵軍，形成對太行山的大包圍態勢。太行山區又分爲東西兩區，東區由廿四集團軍龐炳勛負責，有四十軍（龐兼軍長）和新五軍（軍長孫殿英）；西區爲廿七軍（軍長范漢傑），名義上列入廿四集團軍序列，但仍受卅四集團軍胡宗南節制。

戴雨農對太行山區的重要性，早有認識，也早有過安排。當民國廿六年八月，南口戰役結束，敵軍繼續西侵的趨向日益顯明之際，戴雨農即

曾下令成立晉綏察區，派李果謙為區長，馳赴太原，就近加強部署並負責指揮三省的情報工作，其後敵軍南犯，太原不保；共軍復暗施阻撓破壞，以致國軍在山西的行動，頗受影響。為牽制敵軍，防制共軍；勢非組織民間武力，建立基地，從事敵後游擊不可；戴乃與十三軍軍長湯恩伯討論此事。在湯的贊助之下，授予李果謙十三軍游擊司令的番號。當設司令部於太行山，策聯河南、河北、山西三省的民間武力，組成游擊隊，共達三萬人。不僅用以襲擊敵偽，且可防制共軍兼併坐大。後來中央決定封鎖黃河，並以敵後游擊任務，專付冀察游擊司令孫殿英，以及河北民軍總指揮張蔭吾。李果謙祇好將部隊交給孫、張收編。

現在，由於「華北督導團」在中條山區優越的表現；同時，軍統局在山西的情報組織於民國廿九年五月，遭敵偽破壞，被捕去同志七十餘人。因此，戴雨農考慮到如果能派人前往太行山區，一面組織羣衆，加強軍民合作，發生像「華北督導團」樣的作用；一面以武力為後盾，加強山西方面的情報和行動工作，打擊敵偽；實在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於是他和卅四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將軍談起此事，胡也有同感；乃由廿七軍軍長范漢傑具呈軍委會，請求派一熟悉晉東南情形的幹員，前往太行山，協助軍隊工作。軍委會批交軍統局辦理。戴雨農把這一項艱巨的任務，交付給山西人喬家才。

當時，戴雨農除了派喬家才赴太行山，同時

也派劉培初去湖北恩施的第六戰區工作。喬和劉，都擔任過軍統局督察室主任；也都有一種勇於批評的性格，往往聲色俱厲，不顧一切。戴雨農用其所長，大度包容；可是出外應付複雜環境，所與共事的人物，品類不齊，各人的心性不同；萬不可以軍統局的同志愛去衡量別人。因此，戴雨農藉替他們餞行，把酒暢談的機會；以輕鬆的談吐，對他們加以匡正。誘導他們對任何事情，不要僅看到局部的或者一時的缺點，就對整個的事態，有一種悲觀的看法和責難的論斷；而必需從大處看從好的一面看。同時，希望對一個人或一件事能夠改正缺點為優點；在糾正的方式上，也有比較嚴厲批評更好的方式。他並且說個比喻給他們聽，他說：

「我們軍統局的高級幹部以湖南人最多，浙江和廣東人次之，山西人最少；如果以山西人的生活習慣來看湖南、浙江、廣東人，你能看得順眼嗎？」

「一個人也需有天地之大無所不包的度量，我們對於一個人，不能求其全；祇要取其所長，去其所短，就夠了。」

他這番鼓談，既不傷喬、劉的尊嚴，也達到了機會教導的目的。喬、劉憬然了悟之下，很愉快的向他辭別，分別的各自踏上征程。

喬家才于民國廿九年冬，以軍統局的晉東南站站長的職位，自重慶攜帶無線電機出發；途經西安、洛陽兩地，選調了十位同志，同往太行山。

范軍長見到喬家才，看到戴雨農帶給他的親筆函件，非常歡迎；當即發表他為廿七軍軍部參謀處副處長兼設計委員會的視察專員。當然，這項職位，祇是一種足以使他發展工作的合法身分而已；並不要求他真的去參加參謀作業。

軍區的最高行政機構是廿七軍的設計委員會，由軍長、軍參謀長、各師師長、黨部專員、三民主義青年團分團書記所組成；另設一主任，負責實際責任。各縣縣長，由設計委員會委派；但事實上由軍部和各師所瓜分。雖說表面上已構成一個戰地政務的形態，但是所推行的地方行政，除了徵購糧秣、興辦學校和出刊報紙，有較好的成績以外；其他加強軍民合作、發動羣衆力量等等，仍然有待積極策進。而最成問題的，却是關係軍區生死存亡的軍事情報。

當時，軍中的情報，完全依賴部隊的諜報組；而諜報組的人員素質，良莠不齊，智識水準與技能訓練也不夠理想。尤其有些便衣人員，進出敵前敵後，往往與地方上壞人相互勾結，為非作歹；稍不如意，就誣指他人為漢奸。以致人民對便衣情報人員，存一種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那裏還能蒐集到可靠的情報？更嚴重的，有些便衣人員，甚至還被漢奸收買，出賣情報給敵偽。

因此，喬家才以為要完成太行山的特種任務；改善情報工作，實為當務之急。當決定一方面以軍統局的工作同志為中心，在各縣建立屬於軍統局的秘密情報組織；另一方面則設法健全各縣黨政機構的情報工作，而以籌辦短期訓練班為開

始。

在范軍長的熱烈支持下，短期訓練班調訓各師的擔任情報工作的人員，得到很好的效果。受訓的幹部回到部隊，再轉轉灌輸新的觀念和技術給他們的部下；逐漸，部隊的情報業務，也有了面目一新的改變。

加強軍民合作，太行山已經有個設計委員會的組織，這與中条山完全授權「華北督導團」不同；何況，「華北督導團」是直屬軍委會的公開機構，有團員五百人之多；而軍統局的晉東南站，祇是個秘密情報機構，喬家才本人祇是設計委員會的視察專員。因此，這項工作，必需因勢利導，相機推動廿七軍自身，在這方面多所着力，力求改善；而不是每件事情，都要由喬家才和晉東南站來直接參與處理。

不久，一件足以改善軍民合作關係的事機來臨了；喬家才奉范軍長命令，調查游擊隊和「聯莊會」的衝突糾紛。

當時在太行山區，廿七軍指揮兩個游擊縱隊，分別活動於河南省的輝縣與修武。縱隊的編制很大，縱隊長是中將階級，擔任司令官的都是保定軍校畢業的老前輩；可是縱隊的兵員並不多，素質也不齊，紀律也不好；要糧要錢，增加人民很大的負擔。河南的人民非常強悍，爲了自衛，大都有武器，有組織。輝縣的淪陷區，就有個「聯莊會」的組織，曾經向輝縣縣政府備過案；本來對國軍抗敵防共，都是有幫助的。可是，却因爲受不了活動於輝縣的游擊隊的徵糧騷擾，以及

便衣諜報人員的欺凌勒索；以致常常發生糾紛，甚至在少數人的激憤之下，秘密處決了幾個便衣

人員。於是，游擊縱隊的張司令一再向廿七軍部報告輝縣的「聯莊會」是漢奸組織，殺害游擊隊員；軍部轉報第一戰區長官部，長官部轉請河南省政府查覆。省政府根據輝縣縣政府的報告，答復長官部；說明「聯莊會」不是漢奸組織，而是游擊隊紀律太壞；「聯莊會」爲了防止他們的騷擾，是種出於無奈的「自衛行動」。雙方各不相讓。游擊隊爲了報復，爲了摧糧；竟然把「聯莊會」李會長的兒子捉上太行山，扣押在司令部，假以漢奸罪名。「聯莊會」當然不服，氣憤洶洶的譁鬧起來；此事如不迅即合理解決，可能導致嚴重的不良後果。

喬家才奉命之後，派河南人楊慶明同志，深入敵後，作公正而詳實的調查，徹底的明瞭真相。原來輝縣縣政府，爲了供應國軍的軍糧，不得不利用「聯莊會」的組織，控制敵區的民衆。「聯莊會」既然居住在敵區，又要向國軍供糧；就不能不向敵爲應付；如果從某一種角度去說他們是漢奸組織，也不是毫無根據。可是，游擊隊勒索騷擾，有人失踪也是事實。但無論如何，把李會長的兒子捉上太行山，當爲漢奸扣辦，激起衆怒，總不是辦法，同時也解決不了問題。於是，他向范軍長建議「不要爲了游擊隊的問題，而損害到軍民感情」，主張把李會長的兒子釋放回去，雙方和解。可是軍部既已經向長官部報告過「聯莊會」是漢奸組織，現在又和解，多少有點出

爾反爾的顧慮；加以游擊縱隊張司令的堅決反對，他的建議沒有順利的被接納。

可是，他並不灰心，而再接再厲的進行疏解勸說，尤其對張司令；除了闡述「抗戰是離不開民衆的；激起衆怒，陷國軍於不義，是最要不得」的道理以外；還把戴雨農勉勵他：「一個人也需有天地之大無所不包的度量」的話頭，復誦給張聽，並且加以引伸發揮。張司令感悟之下，欣然接受他的勸告，贊成和解。

於是，由廿七軍下達命令，立刻釋放「聯莊會」李會長的兒子，送到軍部；由喬家才派楊慶明護送交輝縣縣政府；並且責成戴縣長，嚴戒「聯莊會」不得再有殺害游擊隊人員的情事。如果游擊隊人員確有不法行爲，可以押送軍部，一定秉公法辦。一場風波，才告平息。

由於「聯莊會」和游擊隊衝突事件的和平解決，使太行山區的軍民合作；無論是精神的啓發灌注，以及業務的改善增強，都發生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而「聯莊會」的民衆，對於此後軍統局的蒐報情報和爆破行動工作，也充份的盡到了掩護與支援的能事。

民國卅二年二月起，敵軍連續進犯黃河北岸的三個山區。等到戰事結束以後，雖說廿七軍仍然返回以陵川爲中心的防地；仍有足夠力量，保衛太行山。可是，喬家才却發現軍政的配合不夠；於是，他和范軍長討論此一問題。

本來，地方行政，不僅是替軍隊徵購糧食，還要聯絡敵區民衆，幫助我軍，對付敵人；更要

防止共黨的滲透分化。可是，各縣縣長，都是由駐防的各師所派；他們本來是軍官，又不是當地人。所以軍政的配合，平常就做得不夠；再加上戰事發生後，部隊一撤退，縣府也跟着走了；使地方上成爲無政府狀態，同時也很可能被蓄意坐大的共黨軍政機構乘虛填補。因此，喬家才向范軍長建議改由當地的地方人士當縣長。

范軍長和所屬的三個師長都很尊重喬的意見，於是，除了陵川，不是敵區，由軍長委派楊玉鈺擔任縣長以外；其餘壺關的馬子駿、長治的聶吉甫、高平的姬梅軒、晉城的張子仁，都是由喬推荐的。

各縣的行政組織調整以後，首先喬和他們確定一個原則：縣政可以以軍的武力爲後盾，但完全依賴他生存；而必需設法以縣的民衆爲基礎，依賴民衆以生存；所以決不應有隨軍隊進退的打算。在此原則之下，他們都能把行政推行到軍隊的步哨之外好幾十里，直接接近敵人的地區，成了軍隊的外圍；每天過着戰鬥生活，隨時警戒，隨時行動。其中尤以長治、高平、晉城三縣所發揮的效能最大。敵區的民衆，往往自動越過敵人的封鎖線，前來接洽送款，提供敵情動態。因此，不但太行山區的軍政配合和羣衆運動工作向前邁進了一大步；而且也對軍統局的打擊敵軍有很大的幫助。

戴雨農自從派喬家才赴太行山區以後，爲了加強敵後的組織發展，推動工作，即從各方面不斷的給予支援。除了把原來設在晉東南的若干直

屬組織，配屬給喬指揮，還陸續的從後方增派無線電台和新受訓的青年，輸運槍枝彈藥和爆破器材。喬有了充裕人力物力，加上他在山區對軍政配合和接近民衆的努力，局面已經打開；因此，很快的在長治、高平、晉城、修武、輝縣、新鄉、春城、蘭封等地，建立性質不同的特種工作組織；除了經常蒐集情報外，把工作的重點，放在對敵軍的行動破壞上，以配合軍統局全國性的打擊敵僞。自民國卅年六月起，日益輝煌的工作果實，使敵軍受到很大的困擾。

在許多襲擊敵人、破壞交通和礦廠的事件當中；最使敵軍疲於奔命而感到束手無策的，就是有計劃的大規模破壞敵軍軍用電話線。軍統局的工作人員，聯合當地的軍政人員和敵區的民衆；在喬家才命令之下，曾經在一個夜晚，把敵軍在長治、高平、晉城三縣所架設的電話線，全部割取下來，運回太行山區。並且利用這些電線，架設起以廿七軍部爲中心，向東通到太行東區的新五軍，向南通到修武縣政府的電話線。

敵軍爲了防止電話線再被破壞竊取，想出很多毒辣方法，比如責成當地民衆負責看守，否則加以殘害；以及在電桿上綁手榴彈，下面埋地雷炸藥等等；都因爲敵區民衆的充份和軍統局人員合作，而能事先防範，避免受到傷害。

敵軍電話線一再被破壞，毫無辦法；居然以長治司令官名義，用飛機空投一封致范軍長書信，大意爲：「你強迫支那良民破壞我們的電話線，你們中央軍不應有此行爲；希望以後不要再來

破壞。」

喬家才建議范軍長，用副官處蔣處長的名義，回復敵軍一封義正詞嚴的函件：

「破壞電線之事，是出於中華人民的愛國心和復仇心。因爲你們行不義之師，侵犯我國，到處姦擄殘殺。今後不但繼續破壞電話線，而且還要阻絕你們的交通，截斷你們的糧源。如果你們想保全性命，最好放下武器，趕快回日本去。」

由於軍統局的晉東南站，在民國卅年六月以後的半年當中，就襲擊過敵後的據點卅多處，擊斃敵軍一百一十人；當然難免也有人被敵軍擊中。晉城的工作隊長王熙春，就是在襲擊晉城以東十五里的司徒村的一次行動中，當場重傷成仁。（王熙春，山東海陽人，原任七十七師排長，爲喬所識拔，介紹參加軍統局，年廿二）。

軍統局在太行山區的工作，做得有聲有色；而山區生活的刻苦，環境的複雜，却和工作的突出，成爲極強烈的反比例對照。戴雨農愛護部屬，經常關切部屬所處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情況；同時也注意到儘量發揮每一重要幹部的特長，而適才適所的機動使用到某一項重要工作上，以期事半功倍的順利達成任務。

由於此一旨趣，當喬家才在太行山區的工作，已奠定良好的基礎和可觀的規模以後；民國卅一年，他奉到戴雨農將軍的命令，到西安去擔任財政部緝私署的陝西緝私處處長。

（未完待續）